

← (上接12版)

五月还有采药、制药、晒药的习俗。古人都认为蟾蜍生活在月亮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吞食月亮的精华——一枚圆月被蟾蜍一点点地吃掉，就会慢慢变亏。月亮是太阴的话，蟾蜍就是太阴里的阴中之阳。所以，要想取蟾蜍身上的毒，也一定要在阳气最旺盛时候，也就在端午这一天上午。所以清朝时，一到端午节，宫里的一队太监就敲锣打鼓地走到海淀去抓蟾蜍，采它们身上白色的毒浆，再敲锣打鼓地回去。据说端午这天抓住的蟾蜍，拿一块墨塞在它嘴里，挂在那晾到第二年端午节，这块墨就变成神墨了。到底有多神？传说夏天用这个墨在墙上画圈，蚊子就只往圆圈里面叮，不叮人。虽然这些并不可信，但端午那一天抓蟾蜍的习俗是真的，并且很奇怪那一天很少见到蟾蜍，大概都预知难日躲起来了吧。

不光蟾蜍，很多种药只要跟阳有关，在端午节采取都是最好的，比如取蛇胆。可见阴阳观念是理解古代端午节俗重要的路径。

说到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有趣的发现：前面回顾端午起源中涉及的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都跟水有关。按照古人的想法，身体里阳气太盛的话，就要败火。什么东西对火最有作用？当然是水。所以，这些传说里的历史人物如屈原、伍子胥、曹娥、帝高辛氏子，大都拥有水神的性格，能够对五月的阳有所压制。当然大汉将军马援没有死于水，不过他的封号却是“伏波将军”。如果端午节有以水制火的逻辑在里面，那就跟阴阳五行的关系密切，这样一来，可以推断出这些端午传说产生的时间，不会早于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的年代，也就是说，在阴阳五行思想还没有流行的时候，是不会有这些端午节传说的。这已经是战国的事情了。

再从字面上来看端午节。“端”就是“正”的意思，为什么不叫“正”而叫“端”？因为秦始皇姓“嬴”名“政”，为了避讳，把“正”改成“端”，“正月”也会写成“端月”，司马迁《史记》中，“正月”都叫“端月”。《左传》里有“履端”一说，意即新年的开头，是年之始、月之始、日之始、时之始“四始”，秦汉时期就将正月初一称作“端日”。然而，秦始皇是公元前238年才亲政的，避他的名讳也不会早过这一时间，所以2500年历史从哪里来

的，说不清楚。

事实上，我们可以更科学地去讨论端午节起源的可能时间。

竺可桢曾用科学的计算方法讨论《尚书·尧典》里面记载的星象位置。《尚书·尧典》中说，“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他指出，这段记载大约在殷末周初前后，跟当时的天象相对应，距今3000年以前。端午最根本的知识点根源于对夏至的认识。有了夏至的观念，也就慢慢有了夏至相关的习俗。所以往早说，端午起源应该在3000年以前就有了，而不是2500年以前。因为这个时候的传说里已经有历正，有春分秋分和冬至夏至。《左传》里记载“少皞”之世，凤鸟氏管历法，玄鸟氏管春分秋分，伯赵氏管冬至夏至，表明当时已经有夏至的存在了。

那为什么这里有了一个2500年？也许这跟《三国志·魏书·东夷传》里记载的朝鲜半岛的一个习俗有关。朝鲜半岛的老百姓在五月里下种，然后会祭鬼神，载歌载舞，彻夜饮酒。跳舞踏歌，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韩国学者认为他们的端午节起源于这个记载。这段中国典籍中的文字记载，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究竟这个2500年是如何得出来的，不得而知，但这个数字是非常不科学的。非要往前找的话，我们3000年前就有对于冬至夏至的认识了，可以推断当时出现相关的习俗。如果踏实地讨论，则应该是在秦以后，从汉代文化里面找端午节的起源。但不论从哪个立场来说，2500年都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面牵扯到东亚时间和东亚文化的根本问题，就是端午节的文化边界。

清朝最看重三个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古人讲究礼尚往来，这三节是送礼的大日子。日本将三月三和中元节也放进来，叫“五节供”。在古代，端午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节日，在中国流行最广，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日本古代的惟宗公方著《本朝月令》，他对端午节的解释是这样的，“昔楚屈原为惠王以被放湘南，遂无所返征”，然后在某一日的亥时入汨罗淹死了，“其灵化而为鬼神，为天下做旱涝疫气之灾”。所以，五月初五到汨罗江祭祀屈原，划船扔粽子，是为了天下无灾。

韩国《东国岁时记》中讲端午这一天要“颁艾虎于阁臣”。中国宋代会将艾草做成虎形，或者剪彩做成小虎，朝鲜国模仿了这个习俗，颁艾虎给大臣。此外，他们还要贴道教的符，在

“五月五日天中之节”(阳气在正中，所以叫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韩国受道教影响很深，我国古代应该也贴过这样的符。朝鲜人金迈淳曾写过《泐阳岁时记》，说在端午日（也叫水瀨日）这一天，向水里扔饭，纪念屈三闾。他感慨屈原故里与朝鲜半岛“地之相去万有余里，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谣俗不改，精爽如在，何令人感慕至此也”。我读到这段史料时，很为中国文化的力量感到骄傲。

古代的琉球王国即现在日本的冲绳县也过端午节。《琉球国旧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国王在南殿接受文武百官献粽（他们叫其饼）和献菖蒲叶。琉球也有赛龙舟，相传是他们的人在南京看到后学回来的，只是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在每年的五月初三。这个日子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古人不会随便乱定日子。琉球人选在五月初三过节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我现在还没弄清楚。

越南也是我们东亚国家的一个伙伴。《大越史记全书》中说，“天应正平五年（1237）夏五月，端午节，吊屈原及古贤人如介子推者，每年是月皆举行之”，他们每年都过端午节。由此可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几乎影响到了周边很多国家。

这就提醒我们，东亚很多文化要素是大家共有的，毕竟都在同一文化圈内生活，比如新年，二月、八月释奠孔子，三月三上巳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重阳节，冬至等等。其实，这些东西是大家的，因为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历法。

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在朝鲜半岛北部和中部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中国历法此时当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再后来，宋元嘉历、唐麟德历也都在朝鲜半岛被采纳。

日本有一本古书叫《古语拾遗》。这本书写到：“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在这样的文化发展阶段，他们所使用的是以日月和物候为参照的自然历。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佐证。《晋书·倭人传》称之为“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梁书·倭传》称之为“俗不知正岁”。中国古代历法传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翻开《隋书》就可以看到，这时的日本已经“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

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了。

2011年，在福冈西元元冈古坟群（7世纪中叶左右）出土了刻有显示公元570年的“庚寅”和“正月六日”等铭文的铁制大刀。九州大学教授坂上康俊指出，显示大刀制造年代的“庚寅”是基于从中国经由百济（公元前18年至公元660年，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传到日本的《元嘉历》的干支纪年，为日本国内发现的最早使用历法的实例。明确记载历法传入日本的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日本推古天皇10年（602）。这一年，百济僧人观勒给日本带去了历本，日本朝廷还选派了阳胡史主玉陈跟随观勒学习历法。从名字上看，阳胡史主玉陈很可能也是从大陆去日本的移民或移民后代。《政事要略·御奏历》条引《儒传》说：“以小治田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朔，始用历日。”也就是说，在公元604年，日本终于正式采用了经由百济传来的中国历法，一直到明治维新改用西洋历法为止。

古代琉球“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唐宋时期，琉球开始用船跟周边国家往来贸易，“俗习日改，礼节渐作，而政法兴矣”。大明成化元乙酉年，琉球掌握了中国的历法，当时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国，一是日本。有一个叫杨春枝的人，觉得在琉球本土学得还不够，便于康熙六年到中国学习历法，在福建学了四年后，奏请琉球国王编历法。做历法要刻板，还没有刻完，杨春枝便去世了，后由其同族兄弟接棒。最终在康熙十二年，琉球国有了自己的历板。

《尚书·尧典》中“命羲叔，宅南交”的“南交”即指越南。汉武帝平南越，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后千余年实际上为中国郡县，一直用中国历法。可见，越南用中国历法的时间更早。

历法是皮，节日寄身于历法。东亚诸国都有端午习俗，正是有赖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的传播。如果按照“谁发明创造的就是谁的主权”这一逻辑，这些节日当然都可以说是中国的。

不仅仅如此。韩国的韩医、日本的汉方医学，也都与中医中药有渊源关系。有这种渊源关系的还有文字，还有筷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理所当然都可以主张自己的文化主权。如果单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想，那么筷子是我们的，面条是我们的，水稻是我们的，还有很多很多都是我们的。说够了“我们的”不妨自问一句，我们仅仅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是否有

照顾到那些和我们在文化上有深厚渊源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立场？

2016年我同社科院叶涛先生一起去琉球群岛考察，当地有大量的“石敢当”。石敢当置于路冲之地，用来防备邪气冲击自家。这是流行中国全境的习俗，但今天全世界石敢当最集中的地方，居然是琉球群岛。有统计说，岛上有上万块石敢当。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琉球群岛辟邪不光用石敢当，还用了琉球传统的贝壳，还用刻了《南无妙法莲花经》的佛教木板，还有神道的符。在岛上，本地的贝壳、中国的石敢当、佛教的符以及日本神道的符，东亚各种辟邪的文化在这里并行不悖共同存在。这一次冲绳之行，这一点非常启发我。

现实的东亚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重层的文化，不是排他性的。不同的文化完全是可以共存的。拿冲绳的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基点，让我们来一起思考：应该如何认识这些源自中国但最终流行到整个东亚地区的文化？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边境并不是文化之边境。历史悠久的东亚文化圈，其边境远远大于后来的民族国家的边境。而这一地区共有的东亚文化，是我们东亚各国曾经在文化上血肉相连的历史记忆，是可以增进我们连带感的共同的文化财富。

站在世界文化史发展的高度看，世界上曾存在过的欧洲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南亚佛教文明圈以及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域文明圈，其涵盖范围都远远大于今天的国家边界，这些文明圈内部有许多长期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突破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政治框架，正确运用好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把这一制度的力量转化为地域统合的促进因素，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树立起一种文化自信，更应该有一种大国的胸怀。我们应当放弃用民族国家的边界来切割东亚共同拥有的文化的思路，而思考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文化财富。我们应当积极地继承它，发展它，因为这是未来东亚国家之间共同合作、共同生存、共同繁荣最宝贵的文化资源。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